

19 世纪中期的梯也尔

刘文立

在法国近代史上,阿道尔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 1797—1877)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开端于复辟王朝(1814—1830)^①,贯穿七月王朝(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2)和第二帝国(1852—1870)。此人经历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充当了镇压公社的刽子手,最后当上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本文论述的是他在1830至1870年间的活动。

(一)

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即七月王朝的执政者奥尔良派是洛克和伏尔泰学说的信徒,“奥尔良主义”系法国大资产阶级——在七月王朝主要是金融资产阶级——达官显贵所宗奉的一种排他性的自由主义。整体意义上的奥尔良派,不论“运动派”或“抵抗派”,“中左”或“中右”,这时均已成为法国政坛的右翼,并未恪守某些史学家所谓的“中庸之道”。这是因为,虽然七月王朝初期正统派曾经从极右方面向奥尔良派反扑,但是1832年贝利公爵夫人煽动旺岱叛乱失败后,他们已不再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奥尔良派长期对抗着以革命暴力争夺政权的“第三位战士”工人阶级,以及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并力图通过改革运动分享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以从奥尔良派的相对位置看,它一开始执政就居于右翼。

那么,身为七月王朝的权臣^②和奥尔良派的主要代表的梯也尔,在金融资产阶级的独占统治时期,对确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起过什么作用呢?毫无疑问,梯也尔在七月王朝的政治活动体现出奥尔良派所共有的反动性和保守性,比如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和顽固抵制改革运动。但是他的施政也不乏鲜明的个人特征,比如通过颂扬和追念拿破仑以挑动狂热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企图重振法国国威,特别是他试图在法国实现英国式资产阶级议会制。梯也尔为使英国式君主立宪制移用于法国所作的努力虽然收效甚微,却在法兰西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确立的漫长过程中留下了向前的路标。

七月王朝统治下,主要由于1789年以来法国社会演进的自身特点,实现完全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局面远未形成。这在1830年宪章里的反映是封建性的王权仍然相当强大,足可与大资产阶级掌握的两院和内阁抗衡。1830宪章(第13条)中虽有“但书”对赋予国王专制权力的1814年宪章第十四条加以约束,却保留着“行政权只属于国王”(第12条)、“国王任命各级行政官员”(第13条)和“由国王和两院提出法案”(第15条)等重要条款。因而,国王根本不是复辟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派所希望的那种“无用的偶像”。对1814年宪章略加修改而成的1830年宪章并未反映梯也尔所鼓吹的“国王统而不治”的原则,甚至邦扎曼·孔斯当所谓“温和的、混合

的”君主立宪制观念也未包容。在众议院里，不存在稳定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830年宪章只将选举的财产资格稍微降低，选民人数增加无几，强大的反对派很难形成，历来势力强大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奥尔良派于是得以排斥其他资产阶级集团，长期掌握众议院多数和主持内阁。而执政的奥尔良派达官显贵又不是清一色的议会党团，他们派系林立，政见分歧，分合无定，相互攻讦。正如梯也尔谈及频繁出入七月王朝内阁的10余名奥尔良派政客时所说：“表面上谁也不想入阁，实际上谁都愿意掌权，可是没有一人敢于沾边，大家唯一精通的是使台上的人无法施政。”^③因而，不甘自己只“统”而让内阁去“治”的路易一菲力普易于佯装超脱党争，在前10年尤为经常地更换内阁，操纵政局。他颇为得意地声称：“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先生不时觉得需要国主，这没有什么不好。”^④1832年5月，经常损害和侮慢国王并拒绝与他分享决策实权的“英国式首相”卡西米—佩里叶暴卒。路易一菲力普闻讯后喜形于色地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至少今天由我统治，单独统治。”^⑤国王迟迟不另派大臣主阁，竟兼任首相数月之久。

于是，实行和坚持责任内阁制便成为七月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确立过程中封建王权与资产阶级夺权斗争的直接反映。

梯也尔忠于自己历来倡导的“国王统而不治”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原则，他认为1831年的卡西米—佩里叶内阁是这种信条的具体化。1836年2月，梯也尔首次奉召组阁，他基本上自行遴选阁员，而非依惯例让国王钦定，给人的印象是将所有各部都抓在手中。数月后，主张援助西班牙自由派的首相与反对向外用兵的国王产生政策分歧。路易一菲力普坚持己见，梯也尔据理力争，强硬声辩，“如果国王不再容许讨论，那么自己随意治理，颁布敕令好了。但只要大臣们还在负责，陛下就必须听到他们的意见。”^⑥因为分歧未能消除，梯也尔在8月毅然辞职。国王有权授命组阁，又可越过议会自行倒阁，还召来非众议员莫雷(Moïse)继任首相，以便成立“听命于王的内阁”，这完全违背责任内阁制原则，令梯也尔愤慨不已。他遂与基佐和巴罗(Barrot)组成反内阁的同盟，声称：“国王在嘲弄我们。他很清楚，一旦我们团结起来，他的傀儡内阁一刻也呆不下去。”^⑦这场虽由野心和权力欲所驱使但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原则攸关的联合斗争，导致1840年3月第二届梯也尔内阁的组成。在梯也尔坚持下，路易一菲力普被迫让步，阁员全由首相挑选，国王不出席大臣会议，重大问题由国王和梯也尔讨论。时人路易·勃朗(Louis Blanc)写道：“这届内阁是由于议会的意志而强加给国王的，其使命是驾驭王权并使代议制政体神圣化。”^⑧《辩论报》认为：“这是对王权本身的打击”，《国民报》则说：“《辩论报》讲得对”。梯也尔内阁成立时大臣依惯例向国王宣誓，路易一菲力普答称：“诸位，我被迫接受你们和忍受我的耻辱……，你们把自己强加于我…，我终于成了立宪君主…^⑨。但事实上，路易一菲力普仍在极力维护王权，抵制内阁。国王拒绝使法国的政体模仿英国的制度，梯也尔则坚持要求国家元首将政治领导交与在两院拥有多数的内阁首相。1840年10月，梯也尔内阁因“东方问题”倒台，史家认为，“梯也尔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失败，对国王和领导阶层而言是一种过于好战的外交的失败，而且也是旨在扩大议会制的那种努力的失败。”^⑩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论及1830至1840年间七月王朝统治下的议会与王权的斗争，时人贝利耶(Berryer)客观地指出：“每个留意观察10年来议会状况的人都知道，众议院内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七月革命初期。它使众议院明显地形成两派，即便这两派时而再分再合。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一派要使议会权力占居优势，另一派要使王权占居优势。”^⑪十分清楚，前一派试图强化缓慢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后一派竭力维护从长期封建

传统因袭而来并为1830年宪章所确认的仍带专制性质的国王权力。我们看到，继卡西米-佩里叶之后，梯也尔是前一派的主要代表。

1840年10月至1848年2月的苏尔特-基佐内阁和基佐内阁被认为是“国王个人的政府”，基佐曾为自己申辩，说“王位不是一把空椅子”^②。基佐如此听命于国王，连王子儒安维尔(Joinville)也率直写道：“不再存在大臣，他们的责任已化为乌有；一切事务都上达国王，这全是国王曲解我们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一手造成的。”^③若对照一下1836年、1840年的两届梯也尔内阁和这以后实际上的基佐内阁，同样身为七月王朝的首相，在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斗争中，梯也尔作出了基佐无法与之相比的顽强努力。

七月王朝之初，正统派和教权派蓄谋颠覆根基未稳的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新秩序，奥尔良派必须继续打击这股企图再度复辟半封建专制政体的极右势力。凭藉七月革命才跻身于新政权统治集团的“暴发户”梯也尔，对正统派和教权派采取了比其他奥尔良派达官显贵要严厉得多的立场。

1831年2月14日，极右势力在巴黎举行悼念贝利公爵的集会以煽动民众反对七月王朝，不料反而激起对复辟政权深恶痛绝的首都人民的暴力反应，他们捣毁了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凯朗的宫廷。政府派阿拉果(Arago)率领一支国民自卫军进行干预，而身为副国务秘书的梯也尔却站在“乱民”一边。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梯也尔曾举起双手以无法形容的赞赏表情喊道：‘人民在愤怒的时候多么伟大呵！’”^④

1832年10月，梯也尔官至内务大臣，此时正统派拥戴的贝利公爵夫人正在西部策划叛乱，他立即派兵征讨。不久，梯也尔与一个匿名告密者单独见面，赏以重金而获悉公爵夫人行踪，将叛乱的祸首一举成擒，正统派以武装暴动复辟波旁王朝的图谋遂归于失败。

为了捍卫七月王朝，梯也尔不择手段地通过收买告密者而捉拿王室贵族妇女的果敢行动，当时曾遭到“公正的”批评家的严厉谴责。其实这是小题大作，按说未可厚非，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职业道德”从来都是服从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全局需要的。梯也尔的一位传记作者乔治·勒孔特(Georges Lecomte)述及此事时指出：“公爵夫人谋求和煽动什么？一场叛乱。什么目的？给政府和国王造成严重困难。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所困扰的政府和立足未稳的国王是**有权自卫的**。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没有滥用自卫的权利”^⑤。梯也尔做了一位决心维护自身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种情况下所应当做的事。

(二)

1848年，梯也尔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反对二月革命。他在同年3月写道“由于事关名誉，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站在国王一边”。同年六月革命中，刚刚当选的“人民代表”梯也尔惊骇地建议制宪议会撤出首都以利于扑灭工人的起义。不久，在总统竞选中，梯也尔作为“秩序党”首领反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候选人，支持他心目中的“傻瓜”路易·波拿巴登上了总统宝座。在协助路易·波拿巴相继击败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而实际上创造了帝国以后，1851年12月2日，梯也尔却被自己认为“绝对微不足道的那个人”一脚踢开，长期脱离政治舞台。乔治·勒孔特认为：“在50年和51年，梯也尔不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保守派，而是表现为一个最热衷于搞倒退的人。”^⑥这一评论是颇为中肯的。梯也尔在整个第二共和国时期皆是如此，均为资产阶级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正象马克思所说：“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政变

止，镇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①⑦}梯也尔在这一时期对于确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毫无积极作用可言。立法国民议会在1850年3月通过了允许教会进一步插手教育的《法卢法》，同年5月通过了限制普选权法。梯也尔对这两项反动法律不仅表示支持，而且是它们的真正炮制者。说梯也尔是有相当民主色彩的1848年宪法的主要掘墓人，一点也不过分。

(三)

梯也尔从1845年至1862年，尤其是在第二帝国前期仕途落泊之时，继续从事历史著述，写出了一部20卷本的《执政府和帝国史》。梯也尔仍然拥护大革命并且颂扬拿破仑，他将波拿巴将军和拿破仑一世的统治当成法国革命的延伸，定该书全称为《作为法国革命史续篇的执政府和帝国史》。身为狂热的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梯也尔遵循拿破仑的遗诏，于1836年力促竖起明星广场上的凯旋门，4年后又与英国达成协议而将皇帝的骸骨从圣赫勒拿岛迎回塞纳河畔，帝国时期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仑擦皮鞋”^{①⑧}。《执政府和帝国史》成书的年代，法国正在摆脱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桎梏，重新作为欧洲大陆头等的强邦崛起。就历史著作对于现实政治所能施加的积极影响而论，梯也尔主要在第二帝国写成的《执政府和帝国史》，当然比他刊行于复辟王朝的那部《法国革命史》远为逊色。

19世纪中叶的法国，在政治舞台上，波旁家族长、幼支的两个王朝已先后分崩离析，第二共和国“无名的空位王朝”不仅使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空前激化，而且加剧了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内部倾轧。在思想领域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教权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展开论战。在充满阶级矛盾、集团对抗和政见分歧的法国社会，拿破仑三世政权为了确保其专制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利用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强化民族主义的一种历史传统、精神力量和心理因素去引导法国人民。而这一时期，唯一可被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党派集团各取所需、为己所用因而程度不同地予以接受的，只能是涂抹着大革命色彩的“拿破仑传奇”。19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革命正蓬勃展开，资本主义经济急需政局稳定以求更快发展，于是作为法兰西民族一种独特传统的“拿破仑观念”，在第二帝国治下恰好可用在精神上、心理上去维系国民的团结。梯也尔颂扬“拿破仑传奇”所能起到的有限积极作用，即在乎此。拿破仑三世虽然憎恶充当帝国反对派的政客梯也尔其人，却将《执政府和帝国史》的著者誉为“杰出的民族的历史学家”，其原因亦在乎此。还有，梯也尔对“大拿破仑”勋业的礼赞，关于第一帝国的连年征战及其悲剧性结局的详尽叙述，一方面反衬着步“伯父”后尘的“侄儿”的渺小，另一方面也令“小拿破仑”引为借鉴，从中汲取教益。

“小拿破仑”通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践踏1848年宪法关于总统无权解散议会或使它无法行使职能的条款(第68条)，在法国重建了帝国专制政体。它代表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即由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构成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与宫廷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拿破仑三世象路易一非力普那样，声称在世界各国的体制中他对英国的制度最为赞赏，可是以普选权和全民表决为掩盖的第二帝国在政权形式的根本方面却承袭了第一帝国的专制独裁体制，而且比它更加集权和完备。就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民主原则而言，前期的第二帝国是对第二共和国的明显反动。在立法和行政等重大问题上，前期的第二帝国较之七月王朝乃至复辟王朝都是一种倒退。马克思评论第二帝国政体时说：“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藪。”^{①⑨}

于是,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寄生机体”,严重地阻碍着和长期地中断了法国社会制度尤其以1848年二月革命为标志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

1863年,梯也尔蛰居多年后当选为立法团议员。此人甫返政坛,立即就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几项重大原则向拿破仑专政提出了挑战。1864年1月14日,梯也尔在立法团发言,针对帝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法律雄辩地要求政府给予“五种必需的自由”。具体内容是:“人身自由”——废除使政府有权不经调查审判就可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和反对过1851年12月政变的人发配流放的《安全法》;“出版自由”——取消政府对报刊的钳制;“选举自由”——官方不得推荐候选人;“国民代表的自由”——议会有法律的创议权,议员有对内阁的质询权;“议会多数派的自由”——即责任内阁制,内阁向立法团负责。他厉声质问:“什么?我们的法兰西,把一切关于自由的观念交给了世界的法兰西,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运用这些自由的观念吗?不!不!”,“难道笛卡尔、波绪埃(Bossuet)和孟德斯鸠的民族不配享有自由吗?”为了促使小拿破仑让步,梯也尔说连大拿破仑在“百日”期间也给了法国“完全的自由”。梯也尔最后以威逼的语气说:“今天,国家还刚刚觉醒,它的愿望会随着提高。这个国家今天还允许我们用最尊重的口吻为它提出要求,也许有朝一日,它将自行强求。”②梯也尔的发言引起反对派议员的欢呼,迫使拿破仑三世的喉舌、国务大臣卢埃(Rouher)处于守势。按照当时左翼人士的说法,“这对全国来说是一本真正的教科书”,“这是对专制主义最实在的打击”。“必需的自由”成为口号在反对帝国专制统治的各社会阶层中广泛传播;波拿巴派则惊呼“危险的梯也尔精神”,叫嚣“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号召革命!”认为“有了梯也尔的舌头,皇帝当不了5年”,皇后本人甚至“相信有必要发动政变”。

梯也尔关于“必需的自由”的要求为什么会在统治阶级内部和帝国反动派中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呢?

这是因为: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实行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耻辱。”②波拿巴主义的专制统治无视1789年、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变革,而梯也尔所谓的“必需的自由”,则对上述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作了回顾和概括,十分引人注目;“这些自由不复存在已经12年了,而谁都不敢要求得到它们”,梯也尔“这个无畏的宣言向许多法国人揭示,自1851年以来,他们离开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已经多么遥远。”

梯也尔关于“必需的自由”的要求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呢?

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作为专制政体下一个低调的进步政治纲领,这种要求能够得到各种反政府势力的支持。从在“国内流亡”的正统派和被迫下野的奥尔良派这些旧王朝的达官显贵、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至在工人群众中影响日增的蒲鲁东派左翼都可起而响应。因而,“必需的自由”在他们强大的联合压力下有可能实现。也应当看到,要求“必需的自由”,对于仍然受到《霞不列法》压制和《安全法》威胁的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人们注意到,拿破仑三世政权在“自由帝国”阶段的施政,尤其是它在1869年7月被迫允诺的一系列改革,正包括了“必需的自由”的重要内容:立法团与皇帝共同享有法律的创议权,它有权选举议长,议员可依据议程对内阁进行质询;1869年12月27日皇帝召请奥利维(Ollivier)组阁的函件②,以及奥利维自行遴选同僚的内阁,表明责任内阁制已具雏形;1870年,《安全法》被废除。这一年,梯也尔自负地声言:“我的主张已确立在大臣们的坐位上。”

第二帝国初年，法兰西的政治现实使梯也尔的政体观念产生了改变，开始从君主立宪逐步向共和主义转化。作为举足轻重的老牌君主派，梯也尔与第二共和国时期“秩序党”其他达官显贵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能预料和顺应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弃旧图新，向资产阶级共和派靠拢。梯也尔的态度改变有利于促使第二共和国时期曾经激烈相互搏斗的秩序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暂时摒弃前嫌，联合而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帝国反对派，推动波拿巴体制由“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进。

1834年，梯也尔认为：“共和制必然导致流血或蠢举”。到了1848年，他与法卢(Falloux)谈到总统选举时承认：“我曾想自己竞选总统，但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如果我遭到失败，这会是秩序观念的失败；倘若竞选成功，我将被迫与共和制联姻，而我这诚实的小伙子实在不愿去娶如此坏的姑娘！”至50年代中期，他的调门已迥然有别。1848年两次革命、帝制复辟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使梯也尔也意识到了法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在帝国专制统治尚处于鼎盛的1855年，梯也尔就预言：“至于未来，它是属于共和制的。目前形式的政府只是一个停顿阶段。未来不属于只能在代议制君主政体里才能得到真正生存条件的那种自由，而是属于民主，属于共和制。”^{②③}梯也尔由长期崇尚君主立宪制所维护的、大资产阶级达官显贵所独有的那类自由，进而认识到将来实行共和制——它会保障资产阶级各个集团的自由和民主——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同在工业革命开展中急剧致富的整个法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是相符合的。卢梭在致达朗贝(d'Alembert)的信中早就指出：“在君主政体下，一个人的财富绝不可能使他踞于一位亲王之上；而在共和国里，财富却能轻易地使他踞于法律之上。”^{②④}马克思则更精辟地论述道：“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取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②⑤}为了对付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资产阶级各个集团必须加强联合，而共和制这种统治阶级的“无名股份公司”比资产阶级一个集团的王朝“独家经营”更有效率，更能持久。梯也尔懂得这个道理，知道应当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在帝国末年明确无误地表示：“有句话我在另一时期曾经说过，现在我开始重复地指出：共和制是最能减少我们分裂的政府。”^{②⑥}

通过1857和1858年的选举，清一色波拿巴派的立法团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五人集团”，成员为奥利维、达里蒙(Darimon)、法夫尔(Favre)、皮卡尔(Picard)和埃农(Hénon)。鉴于梯也尔政体观念的改变，资产阶级共和派转而支持这位从前的政敌。1863年选举立法团时，正是立法团内以奥利维为首的五名共和派催促梯也尔出来竞选。与此同时，长期在帝国政坛销声匿迹的前秩序党重要头目相聚于布罗伊家，协商投入竞选，梯也尔却拒不到会，以示与布罗伊、巴罗、蒙塔朗贝、法卢和贝利耶这些君主派达官显贵政见有别。梯也尔从政生涯中，此为一大转折，“时隔12年后，在很多方面是一位新的梯也尔在公众生活里重新出现。”

梯也尔“新”在何处？“新”在他要成为由帝国各个资产阶级反对派别结成的“自由联盟”的领袖，不愿再充当资产阶级一个集团的党魁。为此，他既不加入共和派集团，也不加入天主教徒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自由派集团。但是，这两个集团的会议他都出席，成为这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集团联合的纽带。在圣·乔治广场梯也尔住宅里，左翼人物法夫尔、奥利维、皮卡尔和达里蒙，与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士诸如拉尔锡、布罗伊、贝利耶和波舍等频频接触。

梯也尔虽以帝国全体反对派的首领自居，但他偏向资产阶级共和派。在立法团里的会议上，他经常庇护和引导共和派议员，自称“我是一把旧伞，上面落过不少雨。”当波拿巴派议

员阻挠法夫尔发言时，梯也尔喊道：“你们不要真理！”这位老牌资产阶级政客栽培那个“迷路的孩子”皮卡尔，自己不便提出的设想和方案让后者代庖。成为“议会制帝国”开端的奥利维内阁，得到了梯也尔有条件的支持。法夫尔干脆把梯也尔当作“我们中间最负盛名的人”。查阅梯也尔在立法团的发言记录，可以看到他的发言不时激起共和派的欢呼，而经常被波拿巴派打断。

可以认为，到第二帝国末期，曾经是七月王朝重臣和第二共和国时期秩序党头目的梯也尔，在观念上已由资产阶级君主派转向了资产阶级共和派。

注释：

① 参见拙文《复辟王朝时期的梯也尔》，载于《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梯也尔在七月王朝历任众议员、副财政国务秘书、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工程大臣、首相兼外交大臣。

③④⑥⑦⑭ 莫里斯·勒克吕：《梯也尔先生》，巴黎1929年版，第119、118、148、154—155、75页。

⑤⑬ J. —J. 舍瓦里埃：《现代法国政治制度史(1789—1945)》，巴黎1958年版，第223、230页。

⑧⑨⑪ 路易·勃朗：《八年史》，巴黎1860年版，第1卷第9、16—17、36—37页。

⑩ A. 雅尔丹、A. J. 杜泰斯克：《达官显贵的法国(1815—1848)》，巴黎1973年版，第156页。

⑫ 夏尔·瑟诺博司：《1815年以来的现代史》，巴黎版，第61页。

⑮⑯⑳㉑ 乔治·勒孔特：《梯也尔》，巴黎1933年版，第50、98、119、171—172页。

⑰⑱⑲㉒ 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3、110、130—131、131、107—108页。

㉔ 该函件称：“我请求你为我指定人员，以组成一个忠实地代表立法团多数派并且能与你协同一致的内阁。”——见阿兰·普莱西：《第二帝国史(1852—1871)》，巴黎1973年版，第219页。

㉕ 亨利·纪勒曼：《论梯也尔的登台和巴黎公社》，巴黎1971年版，第142页。

㉖ 吕加—杜伯尔东：《梯也尔先生全貌》，巴黎1948年版，第301页。

(上接126页)

可见本书标准与敝同乡“文正公”的标准大相径庭。一时不及检对《古文辞类纂》，就记忆所及，与古文派桐城大户也相去甚远。《精华》的选篇标准是“文章精华”，“所谓‘精华’指的是八家文中内容较好、艺术水准很高、能反映作者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前言》)这个标准无疑渗透有当代意识在内。至于严格按标准衡量有无冒选漏选，则各人见解和学识功力有别，难求全部认同。

较之选、注、评说，译文稍嫌逊色。为照顾初学者，不免过分拘泥于一字一句的直译，就显得原文气韵不足。此外，在注释和译文中，也有个别不准确甚至因旧说而致讹误之处。但小疵小瑕，鸿儒尚且不免，又何碍于将此六载功成公诸世人呢？